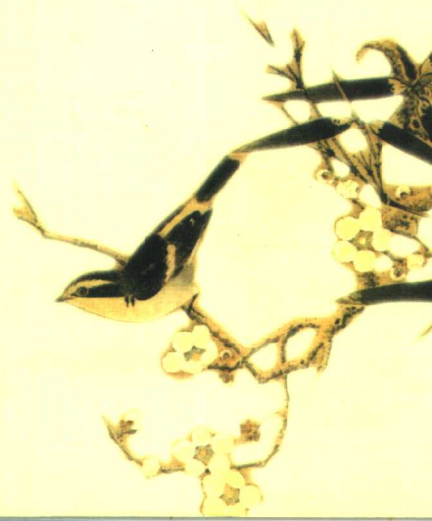


褚斌杰

注评

楚辞  
选评



名

家

注

评

古

典

文

学

丛

书

三秦出版社

I 207.223/6

本书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资助项目

褚斌杰 注评

名

家

注

评

古

典

文

学

丛

书

楚辞选评

三秦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67205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楚辞选评 / 褚斌杰注评. —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4.7

(名家注评古典文学丛书)

ISBN 7-80628-816-3

I. 楚... II. 褚... III. 楚辞—文学研究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9954 号

名家注评古典文学丛书

**楚辞选评**

---

褚斌杰 注评

|      |                                      |
|------|--------------------------------------|
| 出版发行 | 三秦出版社<br>新华书店经销                      |
| 社 址  | 西安市北大街 131 号                         |
| 电 话  | (029)87205106                        |
| 邮政编码 | 710003                               |
| 印 刷  |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印刷厂印刷                        |
| 开 本  | 890×1240 1/32                        |
| 印 张  | 10.375                               |
| 字 数  | 203 千字                               |
| 版 次  | 2004 年 7 月第 1 版<br>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 印 数  | 1—5000                               |
| 标准书号 | ISBN 7-80628-816-3/I·167             |
| 定 价  | 18.00 元                              |

---

# 名家注评古典文学丛书

学术顾问：（以姓氏笔划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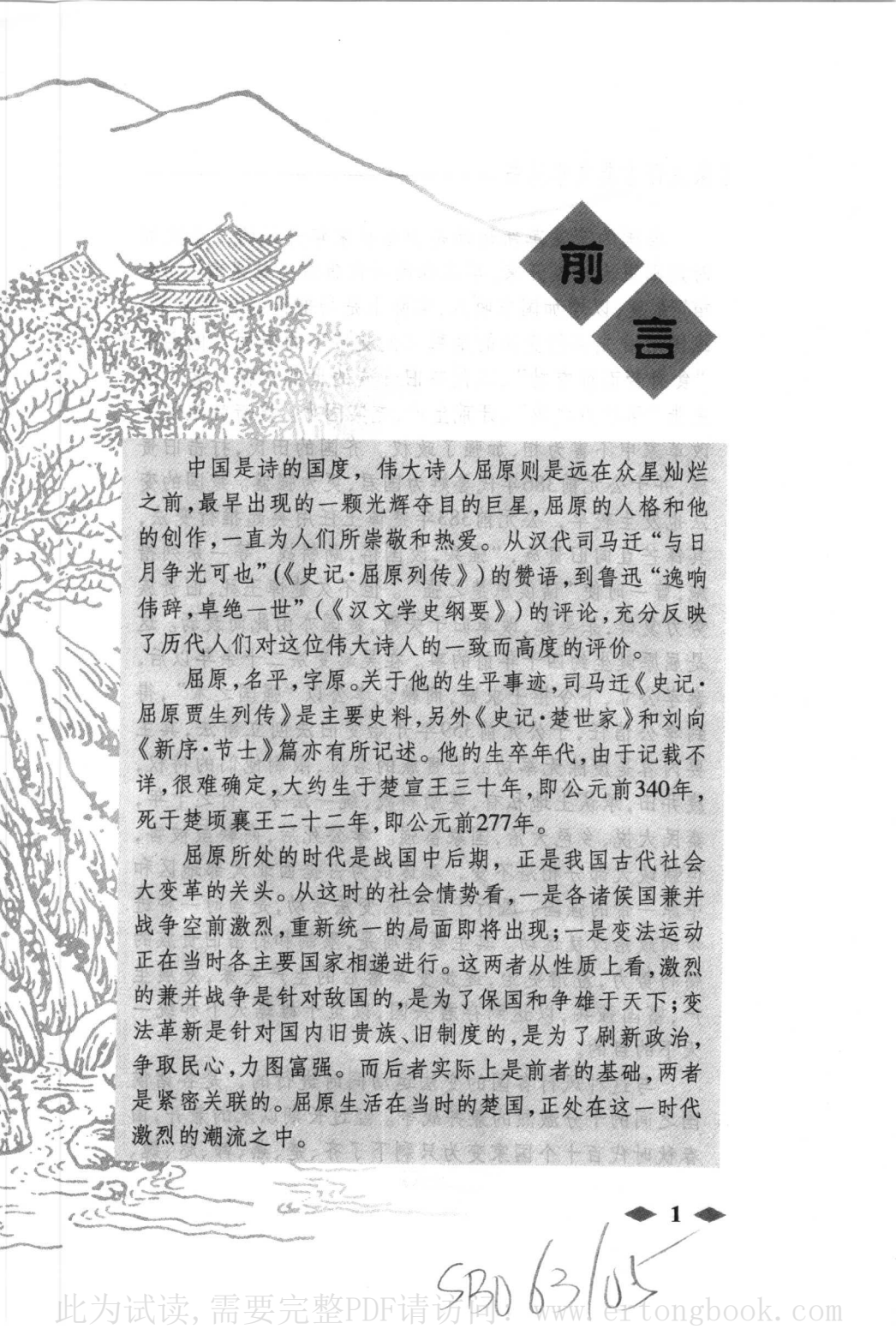
王运熙 王水照 钱仲联 袁行霈

郭预衡 曹道衡 傅璇琮 褚斌杰

编辑工作委员会：

傅璇琮 王水照 陶文鹏 魏全瑞

薛瑞生 阎琦 淡懿诚



# 前

# 言

中国是诗的国度，伟大诗人屈原则是远在众星灿烂之前，最早出现的一颗光辉夺目的巨星，屈原的人格和他的创作，一直为人们所崇敬和热爱。从汉代司马迁“与日月争光可也”（《史记·屈原列传》）的赞语，到鲁迅“逸响伟辞，卓绝一世”（《汉文学史纲要》）的评论，充分反映了历代人们对这位伟大诗人的一致而高度的评价。

屈原，名平，字原。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是主要史料，另外《史记·楚世家》和刘向《新序·节士》篇亦有所记述。他的生卒年代，由于记载不详，很难确定，大约生于楚宣王三十年，即公元前340年，死于楚顷襄王二十二年，即公元前277年。

屈原所处的时代是战国中后期，正是我国古代社会大变革的关头。从这时的社会情势看，一是各诸侯国兼并战争空前激烈，重新统一的局面即将出现；一是变法运动正在当时各主要国家相继进行。这两者从性质上看，激烈的兼并战争是针对敌国的，是为了保国和争雄于天下；变法革新是针对国内旧贵族、旧制度的，是为了刷新政治，争取民心，力图富强。而后者实际上是前者的基础，两者是紧密关联的。屈原生活在当时的楚国，正处在这一时代激烈的潮流之中。

各国的变法革新运动是由春秋末年开始的，至战国时期则更为扩展开来。早在春秋时代鲁宣公就采取“初税亩”制度，以增加国家收入，实际上是局部性的制度变革。战国时首先实行变法的是魏文侯支持下的李悝，他主张“食有劳而禄有功”，以代替旧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度。又主张“尽地力之效”，开荒生产，充实国力。接着韩昭侯用改革家申不害为相，加强了政权。齐国的田氏，打击旧贵族，并于公元前386年代姜姓为国君，更为强盛。楚国的变法也发生较早，公元前383年楚悼王任用吴起推行变法，其锋芒直向旧贵族，“强兵，改国俗，励耕战”等一系列措施，曾一时使“诸侯患楚之强”。但不久楚悼王死，旧贵族势力复辟，杀吴起，改革归于失败，楚国亦由此而衰弱。这是屈原诞生约四十年前的事。在吴起变法二十余年以后，秦孝公立，下令招士求贤，商鞅说孝公以“强国之术”，得到孝公信任，于公元前359年开始变旧法创立新法，其主要内容是废除无军功的旧贵族的名位，限制他们的特权，废井田，承认土地私有，奖励耕战，统一法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悦，乡邑大治，国家富强。孝公死后，商鞅虽被害，但新政大部分相沿不变，秦遂成为占据西北大部地区和中原一带的强国。风行于当时的变法活动，是当时一种进步的政治改良运动。其主要性质是，限制和打击旧贵族的腐朽势力，澄清吏治，逐步变革落后的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富国强兵，以达到存君兴国，以至于雄踞天下和统一天下的目的。

与这种风行各国的变法运动同时进行的，是各诸侯国之间的十分激烈的兼并战争。经过长期以来的兼并，由春秋时代百十个国家变为只剩下了齐、楚、燕、韩、赵、魏、

秦七个大国,出现所谓“七雄并峙”的局面。而在“七雄”之中,又以西方新兴的秦国与人口众多、疆域广阔的楚国最为强大,它们互相抗衡,都有统一中国的可能。所以当时有“纵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战国策·楚策》)的说法,意思是说,如果楚国能够成功地联合东方各诸侯国抗秦,那么便可以称王于天下;如果秦国能够离间楚与诸侯各国的关系,孤立楚国,那么秦就可以在天下称帝。这说明秦、楚是左右当时局势的两个重心。历史的发展已提出统一的要求,并出现了统一的趋势,而统一中国的大业,非秦即楚,可知当时秦、楚两国之间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

屈原生活在楚怀王、顷襄王时期,正是秦国积极向外扩张,采取远交近攻策略,决心灭楚的时候。当时七国的位置是秦居西,燕居北,齐在东,楚在南,魏、韩、赵则处于中部。早在商鞅变法以后,秦即定策先击败逼近秦境的魏国,占据黄河、函谷之天险,为出兵灭六国做准备。前340年至前328年间,秦国数次出兵击魏,逼魏向东迁都大梁,完全占有了魏在黄河以西的土地。此后,秦又出函谷关击韩,并不断侵袭赵国,占领了赵国的不少城邑。此时,六国曾用苏秦“合纵”之策,企图联合抗秦。但由于六国间存在着矛盾,互相并不信任,几次合纵也未能阻止住秦兵的进攻,首次以赵王为纵长,后又推楚怀王为纵长,均先后被瓦解而失败。前316年,秦派司马错先后伐蜀、灭巴,巴蜀之地被侵占,构成了对楚国的致命威胁。在这种情势之下,楚国显然应该刷新内政,富国强兵,并与其他国家建立巩固的同盟,特别是与富庶强大的东邻齐国结盟,以有效地抵抗秦国,但这时的楚国政治却被一些毫无政治远

见,只知苟安享乐的腐朽贵族集团所把持。楚怀王为了挽救王朝日趋衰败的危机,也曾一度倾向于变法改革,但他内受旧贵族的包围和抵制,外受强秦诡计的诱惑,很快动摇倒退而失败。前299年(怀王三十年),怀王被骗入秦,并于两年后客死于秦。顷襄王继位,旧贵族的代表子兰当政,将楚国弄得更为昏天暗日,形成了“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战国策·楚策》)的局面。屈原是一位“博闻强志,明于治乱”的政治家,也是一位有理想、有远见和持正不阿的爱国志士。他出于对祖国的热爱,为了祖国的前途,而与那班误国、昏聩的腐朽贵族斗争了一生。

屈原是与楚王同姓的贵族。屈原的先人原本是楚武王(熊通)的儿子,封于屈地,因以为氏。战国之世,楚公族中以屈、景、昭三氏为最通显。早年,屈原以贵族身份,任三闾大夫之职。“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王逸《离骚序》)主要负责公族子弟的管理和教育。大约由于诗人品德和才学的优异,而受到楚怀王的拔擢和信任,不久即被任命为左徒(仅次于令尹,相当于副宰相)的要职。《史记》上记载,他这时“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在他任职期间,楚国的政治和外交都取得了一些成就。例如他对内主张“举贤授能”,刷新政治,并奉命起草“宪令”,为国家的富强而立法,限制旧贵族的权益。又曾东使于齐,主张合纵抗秦,收复祖国失地,显然这对于楚国的前途都是有利的,至关重要的。可是屈原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才能,特别是他果于执法的精神,却遭到旧贵族势力的嫉恨和反对。他们处心积虑对屈原横加诬陷,离间屈原与楚怀王的关

系,终于使昏庸的楚怀王“怒而疏屈平”。屈原受到排挤,不得再参与重大国事。关于这件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是这样记载的:“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关于“夺稿”的事,后人曾有过许多不同的解释,但可以肯定,上官大夫所以谗毁屈原,绝不能只归为争宠害能的行为,应看做是屈原和腐朽贵族势力的一场政治斗争。屈原在政治上是主张举贤授能的,即《离骚》中所谓“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而所谓“宪令”,就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举贤授能的制度是与“世卿世禄”的制度相对立的,而屈原所草拟的“宪令”肯定要对旧贵族的某些特权加以约束和限制,这样就必然引来旧贵族的强烈反对。屈原在《惜往日》一篇作品中曾有这样的一段追述描写了当日的情形: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媿。秘密事之载心兮,虽过失犹弗治。心纯靡而不泄兮,遭谗人而嫉之。

从这段文字来看,屈原在楚怀王当政期间,确曾参与机密,主持过促使政治革新的变法活动,从而证明《屈原贾生列传》所载屈原草拟宪令一事是可信的。但关于“宪令”的具体内容,史传未载;屈原的政治主张,在他的《离骚》等作品中虽有所反映,但也仅依稀可知。而这段话中的“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一语,却给我们提供了了解屈原变法主张的重要线索。所谓“奉先功”,应是指楚国先人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政治活动和所取得的功

业。而在楚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就是屈原生前不久的楚悼王(前401—前381)时期的吴起变法。关于吴起变法的具体主张和政绩,在一些古文献中有较全面的记述,归纳起来主要是:一、改革世卿世禄制度,限制和废除贵族某些特权,“废公族疏远者”,“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二、罢黜无能无用之冗官,选贤授能,“罢无能,废无用,捐不急之官”;三、明法令,“塞私门之请”,“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以改变国俗民风。四、抵制纵横游说之士,“破横散纵,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以定楚国之政。如果把上述吴起的政治主张,与屈原作品中所透露出来的所谓“美政”理想,以及他在从政活动中的某些作为相对照,就不难发现其相同或相通之处。吴起变法曾一度使楚强盛,“兵震天下,威服诸侯”。但他触犯了楚国旧贵族势力,“故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果然,楚悼王死后,吴起被害,新法废弃,迨怀王即位,楚国已复陷入复旧的局面。因此,屈原的所谓“奉先功以照下”,“造为宪令”,进行政治革新,史书虽记述欠详,但据此殆可推知大概。但由于旧贵族势力的顽固和强大,屈原与吴起同样遭到了失败的命运。贵族群小们的谗毁(“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以及楚王对刷新国家政治所表现的反复无常(“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齎怒”,“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改革终于失败了,而屈原被疏。改革的这一挫折,使腐朽的旧贵族势力重新左右了楚国,这一失败可以说关系着整个楚国的命运。

果然,屈原在政治上失势以后,楚国的局势起了很大变化。当时,楚怀王宠姬郑袖和大臣靳尚等旧贵族集团人物,完全包围了楚王,而且更加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起

来。他们甚至接受秦国的贿赂,公开地出卖楚国的利益。《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对这一时期发生的事曾有比较具体的记载,简括地说,就是昏庸、贪利的楚怀王,因受秦国派来的使臣张仪的政治欺骗,而与齐绝交,结果楚国孤立。怀王曾愤于受秦国的愚弄,两次伐秦,都遭到惨败。第一次楚攻秦战于丹阳,楚国大败,损兵八万多人,大将屈原被俘,秦国夺去了楚汉中六百里国土;第二次楚王竭尽全国兵力击秦,又大败,而且韩、魏也来袭击楚国后方,楚只得退却。经过这两次失败,楚国内势大为削弱。怀王这时虽又有过联齐的活动,但受到腐朽旧贵族的干扰,始终没有成功。相反,怀王晚年,受到旧贵族的怂恿,又去与秦讲和,结果被秦扣留,终于死在秦国。

怀王囚秦之时,顷襄王继立,任用旧贵族子兰为令尹,继续对秦执行投降政策。结果秦国不断削弱楚国,顷襄王十九年(前280),秦军伐楚,又夺去上庸和汉北一带地方。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下郢都,楚军全部溃散,顷襄王逃往陈城(今河南淮阳县)。楚国从此一蹶不振,直到公元前223年为秦所灭。

这就是楚国后期的一段历史。屈原死在楚国最后覆亡以前,但楚国的这段极为悲惨的衰败史,是他亲眼目睹以至亲身经历的。

据史传记载,并证之屈原的作品,屈原一生屡遭变故,主要是在怀王朝,遭谗后被疏远,失去了怀王的信任,被免掉了“左徒”的官职。并一度被排挤出朝廷,离开郢都到汉北去流浪。另外,是在顷襄王朝,遭到更大迫害,被放逐于江南,直至死去。屈原的作品,除他早年所写的《橘颂》以外,都是在他蒙冤被疏以后,以及遭遣逐期间写的。

屈原最初曾受到楚王的信任，为了振国兴邦，实行“美政”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从事救亡的革新活动。但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遭谗被疏。他满怀“存君兴国”之志，却唤不醒昏庸之主，眼看楚国兵挫地削，危亡无日，自己却竟被疏失位，救国无门。这对于忧国忧民的一位爱国志士来说，能无怨乎？于是他的满腔热情变成了无比的悲伤与愤慨，从而写下了震古烁今、历史上最为有名的长诗——《离骚》。诗中有云：“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又云“曾歔歔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这时他面临着各种诱惑和选择：或放弃理想，避世远祸，逍遥自适；或离开楚国乡土，到他国去做客卿，这在当时所谓“楚材晋用”的风习下，也是可以的。但他不肯放弃理想和责任，更不肯弃国出走，而是决心与祖国共命运。在长诗的最后，他说：“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离骚》正是诗人蒙冤被疏以后，蕴藏着爱国激情，饱含血泪写成的一首悲伤怨愤之歌，读之令人摧肝裂胆、惊心动魄。

屈原既黜，由郢都溯江北上，流浪于汉北。《抽思》一诗的“倡”辞中说：“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好姱佳丽兮，胖（分离）独处此异域。”鸟是屈原自比，美人则指怀王，可知《抽思》是此时所写。诗中他指责了楚怀王的虚骄自用和性格多变，并抒写了远离国都的痛苦：

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岁？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

一方面表现了诗人度日如年的痛苦，同时也表达了他对于国都不能须臾忘怀的感情。诗中还有这样的诗句：

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

意思是说，他本来是可以逃开这块使他受难的国土而去自寻出路的，但一看到人民所遭受的苦难，而又强行冷静下来，感到绝不能离开。诗人把爱国和同情人民的苦难遭遇结合在一起，是深刻而感人的。这首诗是以这样的诗句结束的：

道思作颂(即作歌)，聊自救兮。忧心不遂，斯言谁告兮？

心系国君，而又无从诉告，烦冤愁苦，无以自解，这正是他此时流浪在外时的主要心情。

怀王三十年，秦昭王于大败楚军以后，要求怀王“会武关，面相约，结盟而去”。怀王欲往，恐受秦的欺骗；不去，又怕触犯了秦国之怒，故而犹疑不决。据记载，这时屈原已回郢在朝，于是他与大臣昭雎皆阻楚王前往，认为“秦虎狼之国，不可信”，认识到这不过是秦的骗局，不如“发兵自守”。但以怀王幼子子兰为一方的对秦妥协派，却亟劝怀王前行，说“奈何绝秦欢”。结果，耳软心活的怀王终于听信了子兰等人的话而往秦国。终不出屈原、昭雎所料，怀王至武关，就被秦裹挟至咸阳，待楚王如番臣，并以割地相要挟，楚王不许，结果被拘留于秦。

这时，楚国内部发生了危机、混乱。楚大臣欲立当时在国内的怀王儿子为君，而昭雎又出来反对，结果将质于齐的太子横接回，“立为王，是为顷襄王”。顷襄王三年，怀王卒于秦国。

对于怀王末年的这一变故，在屈原看来，乃是一桩丧君辱国惨痛无比的事，从而他对劝楚王入秦的祸首子兰等人十分愤恨，结果遭到子兰的迫害。子兰唆使上官大夫

进谗言于顷襄王，而流放屈原于江南。从屈原的作品看，屈原这次被流放的时间很长，在极端困苦、彷徨中走了很多地方，未得生还。屈原首先从郢都顺江而下到了陵阳（今安徽青阳县南），停了一个时期又溯江而上到达了辰阳。后又南折入溆浦（辰阳、溆浦均在今湖南沅陵一带），不久下沅入洞庭湖，渡湘水而达汨罗。屈原在这期间，虽然一直煎熬在极端痛苦的生活中，往返走了许多路程，但他忧国忧民的心志始终未变。就在屈原渡湘水到达汨罗附近，时当顷襄王二十一年（前 278），秦将白起率大军打进了楚国，拔郢都，烧楚先王陵墓。这一重大事变，使诗人屈原感到一切希望都破灭了。他不忍见自己祖国为秦所灭，不忍见自己的家乡父老遭亡国之难，为了殉于自己的理想，表明自己至死不离祖国的决心，大约于次年，即顷襄王二十二年，投汨罗江自杀了。在他临死前所写的绝命辞《怀沙》中，他再一次揭露了楚国“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皇在笱（竹笼）兮，鸡鹜翔舞”的黑暗现实，同时冷静而严肃地说：“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人生稟命，各有所错兮；定心广志，余何畏惧兮”。这说明屈原的死，不单纯出于感情上的激愤，也是出于自己的理智。他和那个黑暗的社会既然不能调和，而国破家亡的现实更使他无路可走，就只有以一死来表明自己的志向，来殉于自己的国家了。《怀沙》首句记述时令：“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这和后世传说他死在五月初五是颇为接近的。屈原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但他留下的充满美好理想和爱国激情的伟大诗篇，却永远为后人所传诵；他在人民的心目中获得了永生。

屈原的作品，按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记录的篇数

是二十五篇，但没标出具体篇目。见于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的有《离骚》《天问》《招魂》《哀郢》和《怀沙》等五篇。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是我们今天所见的最早的《楚辞集》，它标明属于屈原的作品有《离骚》《九歌》（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篇）《远游》《卜居》和《渔父》，篇数与《汉书·艺文志》相符。但后人对于王逸的这个篇目也提出许多疑问。例如《招魂》一篇，司马迁明明说是屈原的作品，王逸却把《招魂》题为宋玉所作。又如《卜居》和《渔父》都是根据某些关于屈原的传说敷衍而成，很难令人相信是屈原自作。其他如《惜往日》《悲回风》和《远游》等诗篇，是否真是屈原作品，后人也有怀疑。先秦的书，多是汉人编定，由于经过秦火和传抄，其中难免真伪杂陈，须要后人加以审辨。研究屈原的作品，也须要作一些必要的考证。这些问题由于比较专门，这里就不详加论述了。

屈原作品虽然存在着真伪问题，但如下的一些作品还是无问题的，如《离骚》《天问》《九歌》和《九章》中的大部分诗篇，以及《招魂》，一般皆认定为屈原所作。本书即选取这些作品作了注评，也选了某几篇尚有争议的存疑之作，供参考。

关于屈原各篇作品的主旨和思想，艺术特色与成就，在本书中都分别做了介绍和点评，此处就不赘述了。值得深入认识和特别指出的是关于伟大诗人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以至文化史上的地位问题。

首先，屈原的出现，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发展中划时代的事情。我国文学起始很早，屈原以前，已产生了“诗三百”篇。但那是一个民歌时代，大部分作品是靠口耳相传

的集体创作,没有作家的名字流传。由于作者分散和它的集体性,也很少有能集中体现作者人格和强烈个性的作品,也就是说,在文学发展的初始阶段,还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屈原的出现,则结束了这样的一个时代,他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诗人、作家。从此,文学史上出现了作家林立、群星灿烂的局面。屈原正是远在众星之前,出现在中国诗坛上的一颗巨星。其二,屈原是中国文学优良传统的开创者、缔造者。如中国文学中的伟大爱国主义传统,就是由屈原开其端的。又如在中国文学观念中,向来有人品与文品、道德与文章并重的观念。朱光潜先生在《诗论》中曾说:“大诗人先在生活中把自己的人格涵养成一首完美的诗,充实而有光辉,写下来的诗是人格的焕发。”朱先生论的是陶渊明,其实屈原正是这方面最早的典范。屈原的高尚人格,是他创作出伟大作品的基础;他的美文,是他的“美政”理想和美的人格体现。这种人品与文品的统一,一直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重要尺度,也是后世诗人、作家在人生和创作中所努力追求的。其三,屈原是中国骚型艺术的创造者。屈原之前,《诗》为中国文学开创和奠定了如实反映社会现实的伟大现实主义传统;而屈原骚型艺术的出现,则为中国文学开创了另一种创作类型,即通过幻想和想像表达作者深邃思想和强烈感情的浪漫主义艺术。中国文学中所谓诗、骚传统,其后者正是由天才诗人屈原所开创和奠基的。另外,在中国众多的诗人作家中,屈原乃是影响最为深远、最具有群众性的,他的伟大思想和人格,甚至影响到中国民俗,如端午节的吃粽子、划龙船,一直流传至今,在中外文学史上,还没有哪一个作家能享有这样长久、普遍的纪念。

正因如此,屈原与楚辞研究,自古以来就是“显学”。据统计,除笔记、单篇、散注外;自汉以来有关专著就有二、三百部,近十多年来,又出版新著百多部,论文三千多篇,可见屈学之繁荣。

但涉足这一领域的人都知道,屈原研究,谈何容易!两千多年来的楚辞研究史,留下了汗牛充栋的论著,凡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前人差不多都有人思考过、探讨过、论证过,要再前进一步实在很不容易。有位治楚辞学史的中青年学者就曾由衷地发过这样的感慨,他说:“楚辞的世界,博大精深;楚辞的世界,色彩斑斓;楚辞的世界,令人神往!但是,要走进这个世界,竟是如此地困难。由于时代的隔阂,事实的冥昧,文句的艰深,词旨的宛曲,导致了疑义纷纭,久讼莫断。或囿于旧说,难脱藩篱;或游谈臆说,羌无实据;或治丝愈紊,遂成死结。”(周建忠《当代楚辞研究论纲》)这一席话,确实道出了治楚辞学者对这一课题既向往又举步维艰的心态和状况。

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楚辞学仍在发展,而且有着广阔、无穷的空间。照目前看来,楚辞学,或称屈学似乎基本上沿着两个路子在发展,一是随着新理论、新方法的渗透和运用,极大地开拓了楚辞研究领域,如将民族学、神话学、心理学、美学,引入到楚辞学研究中来,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思考,这是楚辞研究中的新现象。另一方面,有些学者仍循着读其书、知其人,知人论世的方法,对诗人的生平事迹、作品、思想进行考索、辨证,也取得不少创获。后者看起来带有“传统性”,似乎没有前者的视野开阔,但这毕竟是研究屈原的一个基础,仍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性。但我以为楚辞研究无论运用哪种方法,何种